

識子改過舉例



讀者書店印行

知份子改造舉例

讀者書店編委會編

讀者書店印行

PDG

知 識 份 子 改 造 舉 例



讀者書店編委會編輯
讀者書店印行

天津官銀號單子街十四號

電話五〇八三三號

電報掛號〇七二八號

非經同意・不得翻印

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版

新
學
社

目 錄

(以姓氏筆劃多少爲序)

自我檢討	朱光潛	一
我的治學與思想是怎樣進步的	吳 晗	五
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	季羨林	九
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	陳 垣	一六
一年學習的總結	馮友蘭	二一
我參加了北京各界代表會議	費孝通	二六
我這一年	費孝通	三〇
解放以來	費孝通	三六
附：寫給費孝通教授	裴文中	四一
我學習了甚麼？	裴文中	四四
關於政治經濟學教學問題的自我批評	樊 弘	五六
附：論經濟學上的第五縱隊和左傾幼稚病		六〇

我光榮地屬於工人階級了……

羅常培……

六九

附：羅常培教授的道路……

七三

自我檢討

朱光潛

中國人民革命這個大運動轉變了整個世界，也轉變了我個人。我個人的轉變不過是大海波浪中一點小浪花，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動，並非出於偶然。

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書人。我從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陳腐的思想，也養成了一種溫和而拘謹的心理習慣。由於機緣的湊合，我在幾個英法大學裏做了十餘年的學生，在資本主義形態的文學，歷史學和哲學裏兜了一些圈子。就在這個時期的開始，中國文化思想上發生了一個空前的變動——五四運動。我關在一個外國學校裏，這樣大的一個變動掠我而過。而我却茫然若無其事。這是我生平的大不幸。歷史向前走了一長段路，而我還停滯在變動的出發點。我脫離了中國現實時代。

在學生時代，我受了歐洲經院的「爲學問而學問」那個老觀念的傳染，整天抱着書本子過活，對於大世界中種種現實問題失去了接觸，也就失去了興趣。實際政治尤其使我望而生畏，彷彿它是一種污糟的東西。二十二年回國，我就在北大外文系任教。當時我的簡單的志願是謹守崗位，把書教好一點，再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假如說我有些微政治意識的話，那只是一種模糊的歐美式的民主自由主義。二十六年抗日戰事起，我轉到四川大學。校長是一位北大哲學系的

舊同事，倒是規規矩矩的辦學，可是因為不會逢迎教育部長陳立夫，過了一年就被撤了職，換了他的黨侶程天放。當時我以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立場，掀起風潮去反對。反對不成，我就辭了職離開四川大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反動政治的壓迫而起反抗。這消息傳出去了，一位在延安做文化工作的先生曾經寫信邀我去延安，我很想趁這個機會去看看我能否參加比較積極的工作。由於認識的不够和意志的薄弱，我終於辜負了這位先生的好意，轉到武漢大學去繼續教書。

在武大待了三四年，學校內部發生人事衝突，教務長沒有人幹，學校硬要拉我去幹。幹了不過一年，反動政治的壓迫又來了！陳立夫責備王星拱校長，說我反對過程天放，思想不穩，學校不應該讓我担任要職。王校長想息事寧人，苦勸我加入國民黨，說這只是一個名義，一個幌子，爲着學校的安全，爲着我和他私人的友誼，我都得幫他這一個忙。當時我也並非留戀這個教務長，可是假如我丟了不幹，學校確實難免動搖。因此，我隱忍妥協，加入了國民黨。我向王校長的聲明是只居名義，不參加任何活動。這是我始終引爲內疚的一件事。參加一個政黨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我所感到慚愧的是我以一個主張思想自由者，爲了一時的方便，取這種敷衍的態度，參加了我不願意參加的一個政黨。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北大，就懷了一個戒心，想不要再轉入黨的漩渦，想再抱定十餘年前初到北大時那個簡單的志願，謹守崗位，把書教好一點，再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可是事與願違，一則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慮憂懼；二則我向來胡亂寫些文章，報章雜誌的朋友們常來拉稿，逼得我寫了一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甚至簽

名附和旁人寫的反動的文章。在這裏我可以約略說一說過去幾年中我的政治態度。像每個望中國好的國民一樣，我對於國民黨政府是極端不滿意的；不過它是一個我所接觸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國好，必須要這個政府好；它不好，我們總還要希望它好，我所發表的言論大半是採取這個態度，就當時的毛病加以指責。由於過去的教育。我是一個溫和的改良主義者，當然沒有革命的意識。我的錯誤已經由事實充分證明，這裏也無須詳說。

在解放以前，我對於共產黨的主張和作風的認識極端模糊隱約，所看到的只是國民黨官方的雜誌報紙，所接觸到的只是和我年齡見解差不多的人物，一向處在惡意宣傳的矇蔽裏。自從北京解放以後，我才開始瞭解共產黨。首先使我感動的是共產黨幹部的刻苦耐勞，認真做事的作風，謙虛謹慎的態度，真正要為人民服務的熱忱，以及迎頭克服困難那種大無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從前所聽到的共產黨滿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國民黨的作風到共產黨的作風簡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換了一個世界。這裏不再有因循敷衍，貪污腐敗，驕奢淫佚，以及種種假公濟私賣國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會感覺到這是一種新興的氣象。從辛亥革命以來，我們繞了許多灣子，總是希望之後繼以失望，現在我們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機。這是我感覺興奮的景象。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學們學習，開始讀到一些共產黨的書籍，像共產黨宣言、聯共黨史、毛澤東選集以及關於唯物論辯證法的著作之類。在這方面我還是一個初級小學生，不敢說有完全正確的瞭解，但在大綱要旨上我已經抓住了共產主義所根據的哲學，蘇聯革命奮鬥的經過，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我認為共產黨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論上所應走而在事實上所必走

的一條大路。

從對於共產黨的新瞭解來檢討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不在我過去是一個國民黨員，而在我的過去教育把我養成一個個人自由主義者，一個脫離現實的見解褊狹而意志不堅定的知識分子。我願意繼續努力學習，努力糾止我的毛病，努力趕上時代與羣衆，使我在新社會中不至成爲一個完全無用的人。我的性格中也有一些優點，勤奮、虛心、遇事不悲觀，這些優點也許可以做我的新生的萌芽。（人民日報）

我的治學與思想

是怎樣進步的？

吳 晗

我正式研究歷史，是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二十年來，除了在課堂上教歷史課以外，還寫了幾十篇專門論文，出版過三本小冊子：一、歷史的鏡子，二、史事與人物，三、明太祖傳。前兩本是在昆明和上海時候寫的零星文字，是以歷史諷刺現實的雜文集。第三本「明太祖傳」我用功夫最多，現在還準備第三次改寫，第一次書名「明太祖」，一名「從僧鉢到皇權」，一九四五年出版，當時正在抗戰，所以一面寫明太祖是一個陰險刻毒的暴君，一面寫他是民族英雄，趕走侵略者，重點放在民族解放戰爭上面。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我的看法改變了，到北京後第二次改寫，寫的是明太祖、罵的是蔣介石。實際上明太祖與蔣介石確也有些地方相似，尤其是出賣革命這一點。當他開始革命時，口裏說爲人民大眾的利益，但當他爬上寶座以後，便變了另一付嘴臉，騎在人民身上，來奴役、剝削以至屠殺人民了。他趕走了壞的統治者自己變成更壞的統治者。我以這種看法重寫第二次，第一次寫八萬字，化了兩個月，第二次十六萬字却寫了一年。寄到生活書店，大概出版了，我自己還沒有看過。但現在看法又改變了，準備第三次改寫，第二次已經否定了第一次，第三次可能又否定第二次。

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工作感覺過滿足，第一次出版，即有許多史家和讀者認為滿意，第二本出版，我化了更多的時間來寫，但現在連我自己也沒有看到出版就不滿意了。第三次我希望能更正確更完全地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去寫，例如在寫第二次的時候，我對於國家的觀念並不是從社會發展去理解，但是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後，才更正確的了解國家是這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工具。在第三次改寫時，我將用這樣的觀點重新去處理我的史料。

在文字上，第一本不大通俗，大學生才能唸，第二本中學生也能唸了，我希望第三本寫得更通俗化，粗通文字的就能唸得懂，給更多的人看。

我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成年成月把自己關在研究室裏，教書的時候因為討厭國民黨腐敗，不願接觸政治，自己專心於學術研究，一九三七年到昆明時，仍然抱這種態度。但自一九四〇年以來國民黨統治愈來愈壞，湘桂戰役一敗塗地，加之惡性通貨膨脹，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夭困苦，於是對國民黨由討厭到痛恨。

在思想上，也接觸了更多的進步書籍，如「聯共黨史」，「蘇聯國內戰爭史」等。蘇聯新作家的作品，如「靜靜的頓河」，「士敏土」，「被開墾的處女地」，「考驗」等，使我看到了一個新的國家的成長，感到中國也非走這條路不可，國民黨反動政府非摧毀不可。其後就參加民主同盟，負責實際的活動。

毛主席的著述給我的影響極大。我過去也讀過許多書籍，如「資本論」等，但不能徹底了

劉靜庵這人，
公認了，
新派分子的劉

解，而且不會把理論與現實結合起來。自從讀完了「毛澤東選集」以後，才解決了革命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的許多問題。如「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農村調查」、「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這些不僅是二十年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總結，而又是事先的科學預見，這對於我們學歷史的人是特別有價值的。

我進解放區以前，看慣了國民黨那套「蔣主席萬歲」一類的標語口號，十分討厭，進了解放區以後，看見了「毛主席萬歲」這些口號，心裏有點不習慣，當然蔣介石與毛主席是絕對不能相比的，但總覺得何必也來「萬歲」這一套。一直到聽了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報告及看了毛澤東選集以後，我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我現在也要歡呼「毛主席萬歲！」因為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的革命很可能還要走更多的歧路，償付更大的犧牲。過去革命犯了許多錯誤，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張國燾路線等，一直到遵義會議才扭轉了歷史；過去錯了而毛主席則是完全對的，例如過去左傾冒險主義者主張打長沙，攻大城市，不要農村，失敗了。當時毛主席根據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與複雜性，主張組織農民，在農村積蓄力量包圍城市。歷史的發展證明他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又如抗戰時期長期在敵人包圍分割下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毛主席的政策是自力更生，自己動手，解決困難！這對今天我們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仍然是完全正確的。

進解放區以前，我們有小資產階級的孤高性，但自進入解放區，看了「毛選」，看了在毛澤

喊一號，毛澤東萬歲！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革命鬥爭的真實反映。

東旗幟下進行着的轟轟烈烈的翻天覆地鬥爭，了解了中國革命歷史和現實後，我了解爲什麼解放區的人民和共產黨員是如此衷心的服從毛主席的領導和如此熱情的高呼：「毛主席萬歲！」

— 8 —

我自己過去寫文章常犯過激、片面的毛病，好的百分之百都好，壞的百分之百都壞，但看了毛主席的著述，看他處理問題，絕不一筆抹煞，如毛主席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二書裏分析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代表人物時，一方面肯定了他們當時對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進行過鬥爭的進步意義，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這個階級由於它本身的脆弱性和對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的聯系和依賴性，所以他們沒有澈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易於和革命的敵人妥協。像毛主席這樣的分析就完全是科學的，辯證法的分析。

現在我感到過去缺點太多，常犯主觀主義的毛病，不敢動手寫東西了。這一方面表示自己思想尙未成熟，另一方面也表示認識了自己的缺點，更向進步的方向走了。

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

季羨林

關於是不是應該把學術還給人民大眾這個問題，現在幾乎沒有詳細討論的必要了。我想，恐怕只有極少數的人還反對這樣作，還想把學術關在天上，只放出點餘光來，讓留在地上的人民大眾仰頭讚嘆，頂禮膜拜。但我爲什麼現在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呢？我的主要用意是想把一個在舊社會裏生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關於這方面思想改造的過程寫出來，讓大家看一看，對有些人也許還有點參考的價值。

我自己是一個在舊社會裏生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自從自己有了點知識那一天起，我就有一個偏見：我反對一切通俗化的舉措，看不起一切通俗化的書籍。我當然崇拜專家，但我所最崇拜的却是專門研究一個問題的專家。問題的範圍愈小愈好，牛角愈鑽得深愈好。最好是一頭鑽進去，鑽上三年五載，然後寫出一篇論文來，這篇論文也許世界上只有幾個人肯讀，只有幾個人能夠讀得懂，這樣一個專家在我眼中纔真正是一個專家，纔真正值得佩服。我在初中的時候，就崇拜過愛因斯坦，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神童，十幾歲就瞭解了相對論。相對論我到現在還一絲一毫都不瞭解，何況二十年前？我當時甚至不知道愛因斯坦是男是女，是那一國人，相對論是屬於那一門科學的。我只聽說，相對論世界上只有七個半人懂，我於是立刻覺得，學問到了這個地步纔真正

算是學問，便對這位愛因斯坦先生肅然起敬了。後來自己弄印度和古代中亞語言學。倘若有人也研究印度語言學或古代中亞語言學，我當然並不反對。倘若有人在這方面有什麼著作，我當然很高興看到。但我自己所最嚮往的却是能够對印度語言學或古代中亞語言學上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問題寫上一部大書，對一個簡單的單字寫上一篇長長的論文，最好還是能够寫到深奧複雜到一個程度，讓一般人，連專家在內，都看不懂，這樣我覺得纔夠味，這樣纔是真正的學術，學術的妙處就在這一點神秘味。倘若有人寫一部通俗的書，無論這個人是怎樣有地位的專家，我過去也許對他曾經一度崇拜過，我立刻就會看不起他。他的書無論寫得多麼好，我總拒絕去看。有時我甚而還搜尋世界上最刻毒的話來批評，武斷地抹煞它的一切好處，即便勉強看了有時候也覺得的確寫得還不壞；但我的偏見却不讓我去讚美它。我總覺得一本讓大家都看懂的書一定沒有價值，大家都看懂了，學術還有什麼神秘味呢？學術而沒有神秘味，那邊值得我們崇拜嗎？

我為什麼這樣作呢？當時並沒有想到這問題，因為根本沒有意識到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存在。是不是有奇貨可居的意思呢？在意識裏，我自問確實是沒有；但在潛意識裏，那就不敢說了。幾千年以來，無論是在世界上那一個國土裏，在所謂文明國家裏也好，在所謂野蠻國家裏也好，學問都操在一小部分的特權階級手裏，學問成了一部分人統治和壓迫另一部分人的重要武器。中國古代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這完全暴露了統治階級的心理。「民」怎樣纔可以「知」呢？有了學問就會知了。正像古代的天神把火的秘密緊緊地握在手裏一樣，統治者把學問緊緊地握在手裏。他們還散佈什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謠言，勞心者就是有學問的

人，勞力者就是沒有學問的人，人而沒有學問當然只好被治了。阿達蘭官同時流行的還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些讀書和這些詩歌都只有有學問的人纔能創造。於是統治者就利用這些有學問的人，這些有學問的讀書人也就幫助他們的「天子」把「民」一下統治了幾千年。

在古代的印度情形也差不多。當時研究學問的種種方便都操在第一階級的波羅門手裏，只有他們有權利可以同神們辦交涉，他們可以誦讀吠陀聖典，可以唱讚美神的詩，他們是有學問的人。他們也就利用他們的學問，把原始人創造的神話加以改變或者自己創造神話，來麻醉人民，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在古代印度人第一聖典梨俱吠陀第十卷裏有一首詩叫做原人歌，裏面有兩首詩，我現在譯在下面：

把原人分割開來，有幾種變現呢？他的嘴是什麼？他的胳膊怎樣？他的腿怎樣？他的兩足叫什麼名字？

他的嘴是婆羅門，他的胳膊是王族，他的腿是吠舍（平民），從他的雙足裏生出首陀羅（最低階級）。

整個原人歌的意思就是把宇宙萬有幻想成一個巨人，太陽是他的眼睛，風是他的呼吸，空界是從他的臍裏生出來的，天界是他的頭化成的，地界就是他的足——這些都可能是原始人類的想法。但有學問的婆羅門人就利用了這原始神話，把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四個階級的來源也神化了。因為自己是第一階級，就說什麼自己是從原人嘴裏生出來的，階級愈低，生出的地位也就愈低，

到了首陀羅，就只好從原人的腳下面產生了。這當然都是鬼話，但學問在婆羅門手中，謠言也只好由他們來造，別的階級只好受他們的麻醉了。

在歐洲中世紀我們找到同印度幾乎完全相同的例子。當時教士階級也是第一階級，學問也幾乎完全操在他們手裏。他們自命是具有神聖性格的人，他們有獨佔管理聖餐的權利，與一般凡人迥乎不同。他們先用種種方法脫開了普通法律的羈絆，終於完全不受政府的支配。羅馬有一位主教基拉西烏斯會說：「支配世界的有兩種力量，教士與國王。第一種力量當然在第二種之上，因為人類行為，連國王在內，都是由他們對上帝負責。」他們的想法，他們的作風，完全同他們在印度的同事婆羅門一樣。倘若有人說，上面這一段話是一位印度婆羅門說的，我想，也沒有人會懷疑。

類似上面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來；但只是上面舉的幾個例子也就可以告訴我們，特權階級怎樣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利用學問來鞏固他們的特權，維持他們在社會上高高在上的地位。我自己以前之所以反對把學術通俗化，是不是也有這個動機，我自己確實還沒有意識到；但在潛意識裏恐怕就很難免有這樣的動機。

但終於來了解放。對我自己說，解放真像暗夜裏一線光明，照澈了許多糊里糊塗的思想。我過去當然不會是唯物，但也談不上唯心，我根本沒有什麼什麼，只是模糊一團。我自己研究的是印度語言學和中亞古代語文。這一切就是我的天地，我天天同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字母相對，腦筋裏想到的只是文法變化，根本沒有時間，也根本沒有興趣來談哲學上思想上的問題，談什麼的。